



4月13日的下午6点多,结束加班的立案庭庭长曲洁路过了杨静的办公室,看见杨静伏在一摞法律文书之间,埋头写着什么。

曲洁问她:“下班了,走不走?”

杨静头也没抬,说:“我没空,还在看案子。”

曲洁摇了摇头,一年审查5000多件案子的杨静,似乎总是在加班。她只好先行告辞,半个小时后,手机响了。

再次看到杨静时,她已经躺在停车场的地上接受抢救,随身的小布包里,曲洁看到了杨静写的东西。那是一份驳回贩毒案二审上诉的材料,杨静的丈夫说,她已经写了好几天。

“望你服刑息诉。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杨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句话。

去世几个星期后,那起贩毒案正式开庭,杨静的材料,为案件的审理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只是这一切,杨静再也看不到了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 何慧蓉



法官杨静(海口中级人民法院提供)



这位女法官一年审查5000多件案子 大姐休息吧,不用再加班了

和蔼的法官“大姐” 所在的服务窗口从未收到投诉

法院的立案庭有些与众不同,一扇扇服务窗口,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服务大厅。来到这里的当事人,有些带着满满的怨气,或是抱怨一审判决不利,或是拿着法律文书破口大骂。曾经坐在6号窗口的法官刘大海,不得不几次平复情绪。转头一看,4号窗口的杨静,面带笑容地解释,耐心翻看文书。几分钟之后,当事人竟然乐呵呵地走了。

“怎么做到的?”刘大海不止一次问过杨静。杨静总是笑着说:“老百姓要的,无非是一个尊重,我们费些时间,把案子的法理和情理解释清楚,人家能不高兴吗?”

气头上的刘大海,恍然大悟。眼前这位胖胖的“大姐”,行动并不灵巧,看上去甚至有些“笨笨的”,却有着最为有效的工作方法。

2016年夏天,两位老人来到了立案庭。他们拄着拐杖,夹着一摞厚厚的法律文书。刘大海看见两位老人转到了杨静所在的4号窗口。几分钟之后,听到那边传来一阵叫骂。

“你们法院是怎么办事的!”老人一边骂着,一边拿起拐杖一通乱砸,把4号窗口的牌子都砸掉了。

叫骂声中,刘大海听明白了,老人对一审判决并不理解,却没有打算上诉。杨静接过了判决书,一字一句耐心地解释。老人几次听不明白,又开始大喊起来。杨静还是带着笑脸,耐心地解释着。

半个小时之后,刘大海再没听到老人的叫骂声。转头一看,老人收起了法律文书,笑着离开了。

工作27年的杨静,已经在立案庭服务了10年。10年间,该院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王心能没有收到一起关于杨静的投诉。他知道,这并不容易,只有真正把心贴近群众的人,才能做到。

立案庭所面对的当事人群体中,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二审上诉。但是个别当事人无力支付诉讼费,给自身的权益维护带来困扰。

得知最高法院出台了诉讼费减缓免政策后,杨静独自编写了一份申请流程,放在4号窗口前,并且逐渐推广到整个立案庭。时至今日,立案庭还在使用这份申请流程。

敬业的单位“大姐” 总能给同事带来欢乐和鼓舞

按照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轮岗制度,业务岗位的工作人员,在工作3到5年之后,可以申请转岗,调去别的岗位。

“有些岗位确实比较辛苦,比如立案庭。”可是10年来,王心能却没有收到过杨静的转岗申请。今年4月份,他找到了杨静,考虑到立案庭的工作压力,院里希望将她转岗至刑事法庭。

王心能询问:“有没有困难?”杨静斩钉截铁地说:“没有!”

那一刻,王心能开始佩服起这位51岁的“老法官”。刑庭与立案庭之间存在差异,法律条文也有所不同,她却依然有勇气面对新的工作岗位。

来自湖南的杨静,十分照顾单位的年轻同事,总是乐于分享她的生活成果。在法院工作4年的刘华琪,就对杨静煲的汤念念不忘。

朝八晚五的工作节奏,常常让刘华琪来不及吃早饭。可是到了办公室,却总是看见拎着饭盒的杨静。

有时带着煲好的汤,有时带着做好的早饭,杨静会笑着招手,喊着办公室的同事们,“大家一起来尝尝!”

刘华琪喜欢喝杨静煲的莲子百合汤,她似乎还能记得汤的味道,也记得起另一种味道。

一起共事将近两年,刘华琪与杨静同在一间办公室,常常闻到杨静身上的膏药味。后来,刘华琪才知道,除了腰疼毛病,杨静还患有高血压。

“你们还年轻,要早早保养身体,可不能像我一样。”有些微胖的杨静,总是笑着对年轻同事说,要好好工作,也要好好保养身体。

可是,杨静还是在日复一日的加班。曾经一天审查了300件案子,并且差错率为零,让年轻的同事刘大海佩服不已。

“杨静51岁,对我说,别的法官一天能审查100件案子,她也能。”说到这里,30多岁的刘大海只能摇头,“我一天最多只审查过70多件案子,杨静能做到的事,我刘大海做不到。”

为身边人留下遗憾 她的人生没有遗憾

那一天早上,杨静送丈夫余建球去医院体检。几天前,余建球就对杨静说,感觉身体不太舒服。

到了医院,余建球脱口而出:“你要不要一块检查检查?”杨静却只是笑着摆摆手:“还有一个案子要写材料呢。”

到了傍晚,余建球和女儿摆了一桌子菜,眼看将近7点,他让女儿给妈妈打个电话。

“喂”,电话里的杨静,还是一如既往的拖长了尾音。

“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?”女儿问道。杨静说:“马上回来。”

那一天之后,杨静的摆手,成为余建球永远的遗憾。

女儿的名字叫“余杨”,是爸爸和妈妈的姓氏结合。从小时候起,妈妈就这么叫着她。那时,房间里堆满法律书籍,喜欢躺在书堆上的余杨,扭头望过去,妈妈总是坐在书堆里埋头写着判决材料。

2015年,余杨获得了一家银行的面试机会,杨静也面临着一次法律考试,母女俩的考试在同一天。头天晚上,杨静推开了余杨的房门,笑着坐下来,鼓励她“一定能考过”。

面试结束的那天上午,杨静第一个打来电话,询问考试情况。最终,母女俩双双通过考试。

那一天的傍晚,走出立案庭办公室的曲洁,想起了几天前的一幕。

杨静负责海口两个区的立案工作,案件量高居立案庭首位。同是“60后”的曲洁,考虑到杨静的年龄,她打算为杨静减轻一些案件压力。

没想到,杨静拒绝了。

“我是立案庭法官,这些本来就是法官的工作。”杨静还是微微笑着,这张满是笑意的脸庞,永远定格在曲洁的脑海里。

当天傍晚7点10分,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的杨静,倒在了单位停车场,倒在了车门前。随身的小布包里,那份案件材料已经写完了最后一个字。普通的小布包,如她平凡的一生,装满了不平凡的故事,在这一刻,落下最后一个标点。